



比较文明学

三

方汉文 著

中華書局

A STUDY
OF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比较文明学

第三册

比较文明的社会形态论：民族、国家与权力

方汉文 著

中华书局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认证”及其他	2
一、国家理论研究的新阶段	2
二、再论所谓的“梁启超问题”	5
三、关于“宗族社会说”	7
第二章 文明与社会团体	11
一、“社会团体”范畴	11
二、家族与世系制度	14
三、婚姻与家庭	18
四、外婚制、黜敬与种姓	21
五、宗族制度与家族关系	27
第三章 民族 (nation) 与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30
一、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理论	30
1. 瞩目民族与民族主义	2. 民族与民族主义范畴
二、民族研究的现实性	37
1. 文明视域下的民族	2. 原生独立民族形态
3. 古代国家的形成及影响	
三、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44

1. 历史联系 2. 现代世界民族时代 3. 关于“民族主义”

第四章 文明与国家理论的实质..... 61

- 一、国家的文明特性..... 61
- 二、东西方文明的国家论..... 64
 1. 争论的关键 2. 东西方国家理论的根本不同

第五章 西方社会经济与世界性扩张 70

- 一、社会意识与权力..... 70
- 二、绝对国家权力：欧洲—伊斯兰—中国..... 73
- 三、西欧工商业文明的历史根源..... 78
 1. 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主要特性 2. 农耕技术大踏步前进 3. 工商业经济的萌发（1）西欧经济制度的转型（2）远眺资本主义的桅杆：从威尼斯到尼德兰

第六章 文明的转型与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 ... 91

- 一、新工商时代中的民族国家进程..... 91
- 二、民族国家的权力与工商业文明..... 95
- 三、国家权力及权力制约 101
- 四、逾越“国家绝对权力” 105
- 五、解析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与三权分立学说 107
- 六、英国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度 111
- 七、北美联邦制度 115
- 八、国家权力论 120

第七章 世界帝国论 125

- 一、古代帝国与世界帝国 125

1. 古代帝国与世界帝国之分轸	2. 封闭帝国与扩张帝国：东西方的不同追求	3. 游牧帝国 (1) 游牧帝国与宗教帝国 (2) 古代游牧民族的制度与经济 (3) 半封建式的游牧帝国	1) 制度化的游牧帝国	2) 非制度化的游牧帝国	3) 游牧民族性格与帝国制度
二、帝国衰亡论	154				
三、东方封建帝国与“东方专制主义”	162				

第八章 纳粹帝国与法西斯主义 171

一、文明的倒行：法西斯主义	171
二、意大利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	175
1. 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	2. 德国纳粹与法西斯帝国主义
3. 纳粹的日耳曼神话	4. 日耳曼主义与西方文明
5. 绥靖主义的历史根源	
三、东方神道的战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	201
1. “海上民族”与“倭寇”	2. 法西斯主义思想与神道、武士道
3. “东亚册封说”与费正清“东亚朝贡体制论”	

第九章 文化帝国主义 226

一、帝国与帝国主义	226
二、文化帝国主义	228
三、文化帝国主义的命运	231

第十章 帝国历史规律与文明差异 237

一、帝国历史规律与机制	237
二、关于所谓的“帝国进步论”	240
三、历史经验与教训	243

第十一章 中华帝国的“文明滞后”与宋明两次变革的夭折	248
一、中华帝国的历史之谜	248
二、千古文明盛衰论	251
三、历史环境与文明机遇	254

为了造就普天下的幸福，有必要建立一个一统的世界政体。

——Dante Alighieri *On World Government* (*De Monarchia*)

理论工作必须阐述帝国与文化的关系。

——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泽东

第一章 “中国认证”及其他

一、国家理论研究的新阶段

从古代希腊起，国家理论就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之一。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后，关于国家理论的研究更是日趋深入。16 世纪荷兰、17 世纪英国与 18 世纪法国的多种启蒙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潮从不同角度冲击着国家理论。19 世纪现代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得国家问题再次突显出来。在此之前，西方理论界的近代自由主义已经名不符实，严格限制国家权限，经济上的放任主义，使得近代自由主义成为了实际上的保守主义。于是，现代自由主义者们主张国家更大程度的干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希尔·格林在《论政治义务原则》一书中，强调国家有义务进行个人自由权益的法律制定，以培养“积极自由”的精神。这种理论不仅对于西方国家是理论支持，而且也成为西方国家努力发展的方向。特别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政治体制中，这种理论引发的相关问题如民族主义等，是相当复杂的。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国家理论的研究也成为迫切的历史课题。

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关于家庭与国家的起源与定性的理论，关于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家庭、民族、国家与世界国家等方面的研究，却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所谓复杂，就是指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已经从原有家庭婚姻起源研究，扩展到新的不断扩大的“欧洲共同体”出现所引起的“欧洲统一国家”与“世界国家”等新方向的探讨。

另一个方面是，研究方法在不断革新，精神分析学方法、人类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等不同学科方法的增加，使得这些关系到人类社会与文明的重大问题前所未有地引人注目。同时，研究的成果却差强人意，真知灼见并不多见，相反，许多陈腐的旧说却陈渣泛起。传统理论的观念的中心地位被边缘化，其结论已经无人认真思考。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很明显，这是对于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理论回应。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比起摩尔根时代来说早已经普及，几乎每一个文科大学生都知道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涂尔干等人，但人类社会理论却已经淹没在对于原住民生活细节的津津有味的体味之中，人类学几乎已经失去了其最初的宗旨，成为一种怀旧的情感抒发，科学性也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萨林斯等人还指出人类学理论中的殖民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所以近年来这一学科理论上不但没有取得新的大进步，相反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境地，琐碎的研究对象与拘谨刻板的研究方式，使这门曾经光彩熠熠的学科变得黯然失色。

斯是道之成，抑是道之毁？

20世纪末期，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在理论上得到了反映，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以苏联的解体发生了力量对比上的转折。于是，理论界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了“历史的终结”，西方学者们已经开始在安排“世界新秩序”。这一历史状况使某些人产生了一种幻觉——历史在重演——中世纪的“罗马帝国神话”再次出现，最奇怪的是，中世纪诗人但丁等人充满神学思想的、本是荒诞不经的预言，竟然成了几位自视甚高的西方学者的法宝。这种神话被用来歌颂资本主义的胜利，“历史终结论”再次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的颂神曲。这

是上一个千禧年以来世界学术思想界中的最突出的现象之一。

世界理论界风云变幻莫测，一些理论界的常青树如哈贝马斯等人依旧引人注目。只是，今日的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同昔日迥然不同了，1968年学生运动中，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产生分化，有的人成为学生的精神领袖如马尔库塞，也有人却受到讥讽如阿多尔诺。如果马尔库塞地下有知，看到哈贝马斯等人今日的表现，他会惊叫着跳起来，高举复仇之剑，如同哈姆雷特那位死不瞑目的父亲一样，光临城堡，希望掀起一场复仇的暴风雨来。《庄子·至乐》中讲了这样的一种恐怖场景：

庄子之楚，见空骷髅，……夜半，骷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①

“辩士”这个词如果用以形容当代另一位理论家——美国人福山——也是再合适不过的。如果说马尔库塞就是这个幽灵，那些当代的庄子们可能会听到这样一段反对的话：

乌托邦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指的是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变革方案。为什么不可能实现？在通常有关乌托邦的讨论中，当一个既定的社会状况的主客观因素妨碍了改革时，在所谓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要实现一个新的社会方案是不可能的，法国革命期间的共产主义方案，也许还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二者都是实际缺乏或者被认为是缺乏主客观因素而使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例子。^②

① 《庄子·至乐》，参见《新编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17-618页。

② [德] 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1967年）”，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研究所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95页。

虽然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听起来像是一种“后现代”的不连续的旋律。其实，法兰克福学者们也的确就是福柯们的前驱。在当代永恒帝国的颂歌再次响起时，它们的声音仍然是西方人能听得进去的乐章，尽管这种乐章有时使他们感到惊悚与恐慌。

家庭、家族、民族国家、世界国家、世界帝国等相互关联的重要范畴，已经使得我们必须从文明角度来讨论它。但是，在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对于目前相当流行的一些看法进行简单检讨，这些看法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关。

二、再论所谓的“梁启超问题”

在开始国家与民族理论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一个关于中国国家认证的荒谬学说予以简要分析。西方学者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看法：即中国学者梁启超等人承认中国没有国家的认证，由于这种看法在国际关于民族与国家的研究中相当盛行，我们有必要予以澄清。

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梁启超在批评中国旧史学时说它有“四蔽”，具体是：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①

梁启超其实是在批评中国旧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不是说中国人不知道有国家。因为他认为中国旧史学没有反映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才进行了批判。事实上这正可以说明，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是有国家观念的，并且这种观念是十分强烈的，否则他不会将旧史学的这一缺陷再次提出。

^① 参见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国之旧史》，载《梁启超选集》，李华兴、吴嘉勳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8—280 页。

同时，我们也要指出，也正是梁氏的这一说法中的错误成分，成为了西方学者的借口，这种伺机混淆是非的做法是十分可笑的。中国史书中关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与民族的观念是极为强烈的，这种观念在同“四夷”等的对比中随处可见。这根本就无须再一一指出了，只需翻开二十五史，几乎无处不在。中国的史学家从司马迁开始直到清代史学家，无一不重视国家制度典章、民族构成、经济社会的研究，这种研究当然全都是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为基础的，所有的史学资料整理、观念生成与结论，无一不是以中国为独立国家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梁启超对“旧史学”无国家观念的批判本身就是无的放矢。

从历史上看，中华帝国作为文明古国，其民族与人民必然首先对这个古代国家进行认证，而古代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在这种认证中，必然有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证，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二者是结合为一的。因此，不能完全否认事实，不承认对于民族与国家的认证。我们谨举《诗经》中的几个例子，就可以将这种看法彻底推翻：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

我征徂西，至于朁野。（《诗经·小明》）

厥德不回，以受方国。（《诗经·大明》）

惠此中国，以为民逯。

.....

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诗经·民劳》）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诗经·文王》）

这些诗句中，既有对于本民族与本国家的肯定，也表达了捍卫民族与国家整体性的意志。由于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

汉族居于国家主要地位。而汉族本身又是由古代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从先秦到明清，众多的民族文化融入了中国文明。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民族文化的重要不同。在欧洲多民族共处的历史环境中，各民族的自我认证是十分突出的。而在中国，汉族虽然区别于周边民族，但汉族作为主要民族，是国家主体，多种民族不断融合起来，即使在元清两代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时代，汉民族所创造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仍然是主流。因此这种民族认证往往与国家认证结合为一。这并不是没有民族认证，更不是没有国家认证。

关键并不在于梁启超本人的说法如何，而在于以这种说法为依据来否定中国人的国家观念，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三、关于“宗族社会说”

有一种“东方宗族社会”的说法极为普遍，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这样的：东方文明是家族中心，西方是个人中心，或是换一种说法，中国社会的构成是宗族社会，西方则是民族国家社会。有一批西方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与人类学家持这种观点，也有一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学者认同这种看法。相当多的中国学者虽然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看到这种观念的错误所在与深远的危害，或是由于各种原因，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表现漠然。本书作者以为，此种评价涉及中国国家的性质与历史，涉及对于中国文明的评价，是绝对不能轻视的。

新加坡的李光耀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东方文化可以分为好几种：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同样的，西方文化也有好几种：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全球化并没有使东方或西方文化变成单一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崇尚廉耻、效忠、诚实、行善和其他美德。不过，东

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中华文化强调的是和谐与秩序，以家庭为核心，社会重于个人。

欧洲文化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欧洲人强调自由、平等和博爱，就如 1789 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精神一样。^①

更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国家与历史特点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是与李光耀相同的。李光耀先生的看法虽然强调中国人以家庭为核心，社会重于个人的特点，没有涉及东西方关于国家与民族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已经使人对中国人的宗族社会观念产生错觉，与现代国家理论中关于国家是非血缘性与地域性的特点相对立。而张光直先生则直接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建立在所谓的家族关系基础上，我们在相关章节已经评论过这种看法，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其二，一种歪曲中国的国家性质，否认中国民族国家认证的说法越来越强，很有在中国人缺席无言的状态下进行宣判的趋势。这就是所谓的“中国认证”（Chinese Identity）。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就一直在讨论所谓“中国的国家认证危机”。首先是对于世界性的“华人现象”与中国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华人的民族认证不等于对于中国国家的认证，这样可以给遍布世界的海外华人以不同的国家认证可能。另外则有形形色色的关于中国民族国家认证困难的说法，其中最为显著的借着梁启超与列文森等人的“中国古代无国家”之说所展开的否认中国民族国家统一性。

要解决以上问题，需要的是有体系的理论。尽管中外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有力的批驳，但是要从理论上真

^① 李光耀：“全球化过程中的东方文化——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文汇报》，2004 年 5 月 7 日 C 版。

正对于这些学说进行销魂薄上的除名，需要有力的一笔。这一笔正是来自于比较文明学。比较文明学的意义所在并不仅仅由于它是一门学科，而主要在于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当然比较文明学本身是一种学科，这是无须证明的，但它更是一种体系化的理论，只有体系化的理论才可能解决这样重要的历史问题。什么是理论体系。所谓体系（system）就是系统，它与部分相区别，代表一个整体，整体是由不同功能、不同作用、不同位置与势能的成分所组成的。在理论体系中，一般是由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部分所构成。除了理论体系构成外，理论体系还有形态上的特征，即由理论逻辑、理论史（包括实践）和理论观念等三大重要部分组成，才可以称之为理论的体系。只有这样的理论体系，才可能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只有这样的体系，才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历史作出系统的解释，而并不只是一种肯定或否定的观点与表述。它才可能对于人类文明历史阶段、社会结构与社会团体的构成作出解释。只有理论体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答问题，如什么是家庭、家族、部族、宗族、民族与国家？理论体系可以对这些重要概念进行缜密的定义与分析，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解决文明归属与特性等根本问题。然后，才可能指出中国文明与中国社会具有什么特点，如何认识它的位置与特性等。

老黑格尔早就说过：

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而且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是假的了；要反驳它也很容易。^①

①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页。

这并不是老黑格尔的故弄玄虚，因为世界学术史的经验恰恰证明：有体系的理论总能战胜零碎的言说或观念。在东西方的学术交流中，古代中国六经与先秦诸子包括老庄孔墨学说，古代希腊哲学和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印度佛教经典都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影响深远。当代比较文明学理论在 21 世纪的中国与日本有较系统的研究，已经形成有体系的理论，只是当这种理论体系是来自东方的声音时，此曲不知能否为西方所理会，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世界的前途，必须有民族与国家理论的解释，这也是我们不得不以理论体系的形式提出解答的原因。

第二章 文明与社会团体

一、“社会团体”范畴

宗族、家族、民族和国家在学术术语中通常被称为社会团体，那么，什么是社会团体，如何看待社会团体呢？

本书作者认为，要理解社会团体，必须先理解人类的社会性。在当代学术界，承认人类社会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性，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这并不是说，其他人类特性并不重要，例如通常所说的理性、道德之类人类所具有的品德并不重要。我们已经说过，理性当然是人类的主要特性之一，道德也是人类最重要的品德等等，如康德强调的“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这无疑是重要而必然的。但是，无论是理性还是道德，都是伴随着人类从动物向人进化的过程产生的，它们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理性与道德产生了人类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原理，也是我们必须首先肯定的。例如只有在农业社会中，才可能产生较高级的封建社会道德体系，君臣父子，伦理纲常。而在原始社会中则不可能有这样的道德。同样，只有在发达的农业文明中，才可能有了理性思维的高度发展，直到今日依然存在的一些处于原始生活状态的民族中，尚未有发达的语言与理性思维方式的存在，就是一个明证。所以从更大的范围内，理性与道德等也属于人的社会性。

社会性是人类的基本属性，其实有不同的层次，首先应当从生物的最直接本性来说，人的社会性包括了直接的社会性行为，例如群居、配偶、养育等社会性质的行为。一定程度上，